

# 史事追尋

## 中共思想史上若干问题

鲁振祥 著

文库

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中央文献出版社

# 史事追尋

——中共思想史上若干問題

中央文獻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事追寻:中共思想史上若干问题/鲁振祥著—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1

ISBN 978-7-5073-2718-2

I. 史... II. 鲁... III. 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研究  
IV. D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05727 号

---

## 史事追寻

——中共思想史上若干问题

---

著 者/鲁振祥  
责任编辑/刘庆旻  
版式设计/景 影

---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四北大街前毛家湾 1 号  
邮 编/100017  
经 销/新华书店  
销售热线/(010)63097018  
印 刷/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

680×960mm 16 开 25 印张 350 千字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978-7-5073-2718-2 定价:45.00 元

---

本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 前 言

笔者前几年出版过一本集子，题为《探索的轨迹——新民主主义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研究》，选入的是2000年前发表或写成的文稿，共20篇，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今次出版的《史事追寻——中共思想上若干问题》，共收文稿30篇，其中绝大部分即28篇，是2001年以来发表或写成的文稿，内有3篇系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基础理论课上的讲稿；另外两篇发表于上个世纪90年代。所论问题均属中国共产党思想史的范围。

《史事追寻》同《探索的轨迹》相比较，有些论题基本相同或相似，但角度、立意和所用材料均有不同。就这部分论题而言，《史事追寻》所收文章，可视作《探索的轨迹》所做研究工作的延伸、补充和深化。当然，《史事追寻》所涉及的问题，要比《探索的轨迹》广泛得多，特别是它包括了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社会主义建设探索和邓小平一些理论观点形成过程两大部分。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的三个“永远铭记”，科学地指明了改革开放伟大事业同毛泽东一代领导人艰苦创业和艰辛探索之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毛泽东思想之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几个发展阶段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继承与发展的关系。本书所论问题，有助于对三个“永远铭记”的理解。

在《探索的轨迹》出版前言中，笔者曾做这样的表白：“这些文章多偏重于史实的梳理，即对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及所涉及的思想理论观点形成发展过程，其来龙去脉，进行考察，同时也力求对这一理论体系和一些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做出合乎实际的历史评价。”本着这样的宗旨和研究方法，《史事追寻》一书仍重在史事的追寻和梳理。因为在笔者看来，史学研究的首要问题，就在弄清史实，舍此便

失去了研究的基础，无从去谈什么分析、判断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本书编辑过程中，笔者曾设想过“史事梳理与钩沉”这样的书名，以更加显现本书的特色，但为简洁起见，还是采用了“史事追寻”这样的题目。当然，重在史事的梳理和钩沉，并不等于只做史料的堆砌和史事的罗列，在揭示历史的本然的同时，一定还要研究历史的所以然，提出对历史事件历史的和现实的价值看法等。所收文章在这方面也做了努力。

史事追寻的基础，在于史料的搜集、挖掘和把握。因此，本书大部分文章的大部分写作时间，都花在了搜集和整理史料上面。一些分量较重的文章的写作，都是先搞史料摘编，然后进行史料梳理，第三步才构思成文。这大概是拙人才用的拙办法。但下这样的功夫也有一个好处，就是比较容易做到论从史出，立论有据，避免空谈。

本书所收已发表过的文章，均原文照录，只作个别文字的校订。因各篇文章都是独立发表的，个别篇目之间在内容上有些重复，收入本书时亦未做删改。有些篇目系根据投稿时的电子版排印，可能同发表稿稍有变化。有的文章编后需要做一些说明，以“作者编后记”的办法处理。

2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市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中央文献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鲁振祥

2008年8月

## 目 录

|                                                    |         |
|----------------------------------------------------|---------|
| 中共思想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问题 .....                              | ( 1 )   |
| 毛泽东半个世纪关于孙中山及其主义和事业论说述要<br>.....                   | ( 16 )  |
| 近代爱国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选择 .....                              | ( 32 )  |
| 青年周恩来的探索求新和信仰选择 .....                              | ( 51 )  |
| 中共革命阶段思想的历史发展 .....                                | ( 63 )  |
| 瞿秋白犯“左”倾错误时期探索贡献的一面 .....                          | ( 78 )  |
| 中共早期“割据”思想和“乡村包围城市”提法史事<br>钩沉 .....                | ( 94 )  |
| 瞿秋白与“工农武装割据”理论 .....                               | ( 117 ) |
| 周恩来与中共早期“农村割据”思想 .....                             | ( 130 ) |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读史中若干问题考察 .....                         | ( 142 ) |
| 毛泽东对国情的把握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br>历史性飞跃 .....              | ( 167 ) |
| 毛泽东使用和认识“半殖民地半封建”概念的历史<br>情况的进一步考察 .....           | ( 178 ) |
| 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                                 | ( 181 ) |
|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党的建设的永恒性意义 .....                        | ( 199 ) |
| 《论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贡献<br>——兼述历史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使用 ..... | ( 210 ) |

|                                                           |       |
|-----------------------------------------------------------|-------|
| 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问题文献发表情况简述<br>.....                           | (223) |
| 毛泽东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几个重要关节点<br>的再考察 .....                      | (236) |
| 过渡时期总路线研究中“外部压力”说评议 .....                                 | (248) |
| 共和国史上“大跃进”一词的应用与演变 .....                                  | (255) |
| 略论六十年代的“调查研究年” .....                                      | (268) |
| 七千人大会与党内民主精神的发扬 .....                                     | (281) |
| 社会主义探索史上有价值的一页<br>——中共领导人 60 年代前期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推进 ...           | (291) |
| 试论毛泽东在 20 世纪 60 年代国民经济调整中<br>的地位和作用 .....                 | (304) |
| 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 .....                                          | (319) |
| 2 试谈邓小平经济建设“死扭住不放”思想 .....                                | (334) |
| 略谈“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论断的提出<br>——邓小平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长期性观点的最终确立<br>..... | (348) |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领袖人物研究的开展 .....                                | (360) |
| 革命实践与革命理论的结合<br>——《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学术座谈会发言 .....               | (374) |
| 《中共党史研究》杂志与中共党史研究<br>——写在《中共党史研究》创刊一百期之际 .....            | (378) |
| 龚育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贡献 .....                                  | (388) |

## 中共思想史研究中的实事求是问题

大家都知道,“实事求是”这个词语,诞生于东汉年间,出自《汉书·河间献王传》。其中有“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话。一千八九百年之后,被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古为今用,赋予新意,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作风、思想原则、思想路线、工作准则的最恰当的表述。邓小平进一步将其称为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一原则具有普遍的意义,我们学习、研究中共思想史,当然也要很好的贯彻。我想着重从材料和思路两个方面讲点想法。

### 一、详细地占有材料,论从史出

在历史研究中要做到实事求是,首先的一条,就是必须下大工夫去搜集整理材料,把依据材料弄清历史事实,作为研究工作的第一步。

对“实事求是”的含义,后人多有解释。唐代训诂学家颜师古的解释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就是说,掌握事实是求得真理的基础、前提。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为克服党内教条主义错误,提倡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对什么叫实事求是、如何做到实事求是问题,作了十分精彩的论述。这就是大家都知道、常被人们引用的一段话:“‘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

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sup>①</sup> 这里毛泽东讲得十分清楚:要详细占有材料,要以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作指导,从材料中引出结论。如此才能做到实事求是。他讲的是党的领导工作,讲领导者如何才能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这对我们史学研究工作来说,也完全适用。不过,毛泽东所讲的“详细地占有材料”,指的主要是现实材料,当然也包括历史材料;而史学研究则主要是占有历史材料,当然也可以搜集一些有关的现实材料。

就研究中共思想史来说,有没有“详细地占有材料”的可能和条件呢?应该说,在“文革”以前,是缺少这样的条件的,因为那时研究者能够见到的材料有限;现在则不然,公开出版的书籍、资料已经非常之多,不用浩如烟海来形容,也可以说是车载斗量,能否详细地占有材料,完全在学者自己的努力。这里我想以中央文献研究室 20 多年来编辑出版工作情况,谈些资料方面的情况。

中央文献研究室从 1980 年成立至今,编辑出版的书籍,仅就领袖著作集、党和国家文献集这两种,加在一起已有一百几十册了。

以毛泽东著作为例。已出版的著作,既有综合性的著作集,也有专题性的著作集,还有专题摘编。综合性的著作集,一是《毛泽东选集》第 2 版,共 4 卷;二是《毛泽东文集》,共 8 卷;三是《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共 13 册。这三种著作集,也是毛泽东著作集中最重要的三种,以后我们将经常提到,简称“毛选”、“毛文集”、“毛文稿”。

“毛选”选入的是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主要著作,第 1 版是毛泽东自己主持编辑的,158 篇文章都是他亲自审定的。从 1962 年起,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已着手进行注释的校订,因“文革”而中止。第 2 版在此基础上做了几方面工作:一是对注释作了较多的修订(其中改变了许多不恰当的提法,如关于 AB 团问题、关于西路军问题、关于托派问题等等);二是对正文作了个别史实和文字上的订正;三是对题解作了少量修正补充;四是增加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全书由 158 篇变为 159 篇),该篇在毛泽东在世时已选入《毛泽东著作选读》中。

“毛选”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载体,无疑也是我们学习研究中共思想史一部必读的领袖著作集,而且应该作为重点。(需要提出的是,因

<sup>①</sup> 《毛泽东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01 页。

为编“毛选”时对有些篇目作了修改,所以从研究思想史的角度,有一个查阅原始版本问题,后面要讲到)

“毛文集”选入的是毛泽东一生中从1921年初至1975年7月54年间的著作,总计800余篇,其中有些篇是集纳件,所以实际篇数要更多些。“毛文集”的篇目与“毛选”不重,绝大部分是毛泽东在世时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毛文集”是“毛选”的补充,特别是补充了新中国成立后20多年间的著作,建国前的部分也编入了不少篇“毛选”没有选入的重要著作,因此“毛文集”也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载体。

“毛文稿”是供研究用的文献集,资料性比较强,选入的都是毛泽东的手稿或经他审定过的讲话、谈话记录稿和以他的名义发表的其他文稿。没有经他审定的讲话谈话记录稿,不收。这一点与“毛文集”不同,“毛文集”收入很多篇经编者整理的记录稿。两者的建国后部分可相互补充。“毛文稿”有多少篇呢?没有作详细统计,估算有4000篇左右。

综合性的著作集还有《毛泽东著作选读》,“文革”前出过甲种本和乙种本,“文革”后又出了新编本,不过,篇目都包括在“毛选”和“毛文集”之内了。

除选集、文集、文稿三种外,还有10多种专题性的著作集,有:《毛泽东军事文集》1—6卷、《毛泽东外交文选》、《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毛泽东书信选集》、《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毛泽东哲学批注集》、《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毛泽东诗词集》、《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毛泽东文艺论集》等。

综合性文集和专题性文集加在一起,共达40多册。另外,《党的文献》杂志还刊载有若干篇没有收入上述著作集的毛泽东著作。如2002年第3期刊载的毛泽东1938年3月20日的讲演《认识中国社会性质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2003年第4期刊载的毛泽东1953年6月1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等,都很重要,前者对研究新民主主义理论,后者对研究过渡时期总路线,都是必读的。有人统计,已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的总字数约1300万字。可以说,有研究价值的毛泽东著作,基本上都已发表了。为便于学习和研究者们查阅,中央文献研究室还编辑出版了180万字的《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著作集之外,还编撰了200万字的《毛泽东传》、140万字的建国前《毛泽东年谱》。建国后

的年谱正在编辑中。著作集中见不到的毛泽东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和讲话,年谱和传记中多有反映。这些著作之外,还有一些文献室人员编写的书,如陈晋主编的《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也披露毛泽东的不少言论。毛泽东一生各种形式的著作究竟有多少呢?湖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版本编年纪事》一书,共列入7571篇,这都是不同时期发表过的,尚未发表的还有多少呢?没人统计过,也不好统计。

其他老一代领导人的著作,文献研究室也出版了许多种。

周恩来的著作有:《周恩来选集》上下卷、《周恩来军事文选》1—4卷、《周恩来早期文集》上下卷、《周恩来经济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周恩来文化文选》、《周恩来书信选集》、《周恩来1946年谈判文选》、《周恩来邓颖超通信选集》、《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1—3卷等。还有大部头的《周恩来传》、《周恩来年谱》。总计是五种:综合性的选集、专题文集、建国以来文稿、年谱、传记。

刘少奇的著作有:《刘少奇选集》上下卷、《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刘少奇论工人运动》、《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刘少奇论教育》、《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4册及《刘少奇传》、《刘少奇年谱》。总计也是综合性的选集、专题文集、建国以来文稿、年谱、传记五种。

朱德的著作有:《朱德选集》、《朱德军事文选》、《朱德诗词集》及《朱德传》、《朱德年谱》。《朱德年谱》是文献研究室出版的领导人年谱系列中最早的一部,2006年又出版了新编本,字数扩充一倍多,达147万字。

任弼时的著作有:《任弼时选集》、《任弼时青少年时代作品赏析》及《任弼时传》、《任弼时年谱》。

邓小平的著作有:《邓小平文选》1—3卷、《邓小平军事文集》1—3卷、《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邓小平论统一战线》、《邓小平论国防和军队建设》等,以及《邓小平年谱》1975—1997年部分、《邓小平传》和《邓小平年谱》1975年以前部分正在撰写中。还有《邓小平思想年谱》,内容都被后来出版的《邓小平年谱》所包括。

陈云的著作有:《陈云文选》1—3卷、《陈云文集》1—3卷、《陈云论党的建设》等及《陈云传》、《陈云年谱》。

关于第三代领导人的著作,主要是编辑了江泽民的论著,有《江泽

民文选》1—3卷,江泽民《论科学技术》、《论“三个代表”》、《论党的建设》、《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有几种专题摘编:《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江泽民论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江泽民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

以上都是领导人个人著作和他们的年谱、传记,此外还有专题性的老一辈革命家论述合集、毛邓江三代领导核心论述合集等。

同中共思想史密切相关的,还要提到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两个系列的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集,一是《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已出版20册,编入了从建国到1965年的重要文献。这个系列还缺1966—1978年部分。二是新时期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包括《三中全会以来》、《十二大以来》、《十三大以来》、《十四大以来》、《十五大以来》、《十六大以来》,已编辑出版17册,以后会一直编下去。

上述这些领袖著作集、年谱、传记和重要文献选编,都提供了大量的中共思想史资料。除文献研究室外,其他不少单位也出版有许多这类书籍。如《张闻天选集》、《张闻天文集》、《张闻天年谱》、《张闻天传》,提供的思想史资料非常之丰富。还有大型资料书,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中的文献部分、《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等。文献研究室和其他许多单位还编辑出版了不少重要亲历者的日记、回忆。如《杨尚昆日记》,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七十年奋斗与思考》,《胡乔木回忆毛泽东》,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吴冷西的《十年论战》等,价值都很高。他们的回忆,许多并不纯是个人的回忆,而往往是个人回忆与历史文献的查阅、引证相结合。

大概可以这样说:在党的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担任过党政军重要领导职务的人,包括早期领导人、后来的重要领导人、理论界代表人士等,大都已经有着作集、传记出版。

除这些著作外,还有大量的当时的报纸、杂志、档案及其他有关出版物可以查阅。

总之,与中共思想史有关的资料是非常丰富的,就看我们是否肯下功夫。即使不靠保密性比较强的档案,只根据已经出版的材料,用心去挖掘,也完全可以做到详细地占有材料,把许多问题的研究推向前进。

老一辈革命家陈云在讲领导机关制定政策问题时,有一个著名的

说法,即: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用不到10%的时间进行讨论和作决定。这是陈云本人的经验之谈,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规律的,也是对毛泽东所说详细地占有材料、从材料中引出正确结论的量化的解释。当然,90%和10%的比例,也是大致的说法。这话也可以用到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来,这就是要把主要精力用到搜集整理材料上,包括历史资料,也包括所研究问题的学术状况。如果在某个问题的研究中,真的搜集到了人所少见的材料,或就同一问题搜集整理了比别人更丰富的材料,据以写成实证性很强的文章,即使有堆积材料的缺点,也要比华丽空洞的文章有价值得多。当然,最好还是既材料丰富,又观点明确,有史有论,史论结合。写文章,最好是先搞一份资料摘编,然后再考虑如何成文。这样写出的文章,不管水平高低,不管别人有什么看法,自己会觉得心里有底,因为这是根据材料写成的,是论从史出的。

6 详细地占有材料,要特别注意查找第一手材料。只有尽量多地掌握了第一手材料,写出的东西才是可信的、可靠的,立论才踏实。能不能从别人的研究成果中吸取材料呢?当然可以,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必须进行查核,即使是权威性著作中用过的材料,最好也只作为查找第一手材料的线索,待核准后再放心地使用。千万避免一种做法,即在自己没有看到原始的第一手材料的情况下,轻易地把别人用过的材料和注释照搬过来;如果我们实在无法找到原始材料,必须转引,也一定要注明转引自何方。不下这样的功夫,心中就会无底,甚至可能出现差错。这方面的例子是很多的。如“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毛泽东思想”两个概念的最早出处问题。大家知道,前一个概念是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首先使用的,他在1941年3月发表的《论布尔塞维克的教育家》文章中最早用了这个概念。但这篇文章登在何处呢?有的著作在注释中说:张如心这篇文章发表在“1941年3月20日《解放日报》”,这就搞错了,《解放日报》这时还未创刊,误把同一天出版的《共产党人》杂志写成了《解放日报》。这很可能是笔误,也可能是印刷中出了差错。如果不查对,照样搬用,不就以讹传讹了嘛。后一个概念首先出自王稼祥1943年7月8日发表的文章《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但近来也有论者发表文章说,“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不是出自王稼祥的文章,而是出自邓拓1942年7月1日为《晋察冀日报》写的社论中。

该论者肯定是没有查阅这篇社论原文,因为这篇社论从标题到内容用的都是后来并未被采用的“毛泽东主义”一词,而未用“毛泽东思想”概念。

运用原始材料,对中共思想史研究来说,还涉及一个版本、特别是毛泽东某些著作的版本使用问题。众所周知,“毛选”的一些篇目,与原始版本有差别,其中包括《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论联合政府》等一些在党史、毛泽东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作。在编“毛选”时,毛泽东当然有权对自己的著作进行修改,但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问题时,就出现一个根据哪一个版本的问题。如果我们是学习毛泽东思想原理,那完全可以按“毛选”版本,即根据毛泽东最后认定的论述;而如果我们学习、研究某一理论观点形成发展的历史,那就要根据著作发表当时的版本,如此才会有过程感,才不会把当初的认识水平拔到后来的认识高度,或埋没了当初本来有、编“毛选”时被删掉的正确思想。如《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两篇,是党史、现代史著作必定要讲到的,我们看到三种处理办法,一是都按“毛选”;二是两种办法都用,不同的篇目不同用法,前一篇用最初版本,后一篇用“毛选”;三是都按原版本。我赞成第三种办法,不要以后来的认识拔高以前达到的水平,而要依靠原版本,反映历史的本来。

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是后来加写的内容,在做历史叙述时,最好不要引用,特别是不要加引号引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反对本本主义》一文,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历史文献,写于1930年,可视作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理论源头的一篇代表作,1964年正式发表时,除重新拟定了文章标题外,内容修改不多,但在第三部分顺着原意加写了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许多人写文章都引用这段话。的确,这段话讲得很精彩,很辩证,整篇文章也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如果笼统地讲:毛泽东曾如何如何说过,也是可以的;但如果你讲历史,作为毛泽东1930年说过的话引用,那就不太符合实际了,因为当时毕竟没做过这样明确的论述。

还有,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现在人们常用的概念,如果不用原版本,而从“毛选”中去找,就根本找不到,只能看到“使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具体化”这样的话。利用外资发展中国经济的问题,本来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有一段话对此表述得很清楚,不用原版本,在“毛选”中也找不到。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某一位领导人的著作,经另一位领导人作过重要修改,引用时也要注意,如刘少奇对张闻天 1948 年论述东北经济成分和经济方针的提纲,曾两次作修改,加进许多重要论述,从已出版的《张闻天文集》和《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两本著作中,完全可以搞清楚当年修改的情况。可是,人们常常把刘少奇加写的话当作张闻天的话去引用。

对“毛选”版本变化问题,日本人曾下过很大功夫进行对比研究。我们作为一般的学习者、研究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对毛泽东的所有的理论上的阐述都做一番版本对照,但对学术界已经人所共知的情况,还是应该掌握。而能说明版本变化的材料,现在能见到的已经不少,所以提出来请大家注意。

以上所讲都是一个意思,就是要详细地占有材料,而且要尽量掌握第一手材料,这不仅必要,而且也可能。这是研究工作的第一步,也是研究工作的基础。也只有如此,才能做到论从史出。

8

## 二、确立正确的思路,求实求新

这里不是讲研究某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写某一篇文章怎样去思考,怎样去谋篇,而是在一般性的指导思想上讲几条意见。刚才讲的论从史出,也是一种思路,除此再讲以下四点。

(一)“探索”的观点。即把中共历史、包括思想理论建设上的成功与失误,放在“探索”的角度去观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包括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是在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前进的。胜利和成功有目共睹,失败和挫折也时有发生,甚至还出现过全局性的重大错误。就党的思想理论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无疑构成中共思想史的主流;同时,也出现过错误的指导理论,如民主革命时期的两次右倾和三次“左”倾的理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左”的冒进的理论、“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怎样去揭示

和合理地解释这样的历史过程呢？很关键的一点，就是要确立一种“探索”的观点。

著名的近代史专家、多部中共领导人传记主编金冲及在一次讲演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大国，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是极不容易的，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新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提出来，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想要了解中国近代历史，‘探索’是一个关键词。离开‘探索’这两个字，很多问题都无法理解。”他进一步解释说：在中国这样一个古老大国中，“怎么进行革命，怎么进行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西方的办法、苏联的办法都不能照搬来用，完全要靠我们自己去闯。中国的民族危机极端深重，中华民族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周围的变化非常快，许多问题都要立刻做出决定，不允许人们都从从容容慢慢地调查清楚以后再来解决。无论在革命时期也好，建设时期也好，在这过程中间的很多挫折，恐怕都需要跟整个探索的过程联系起来才能理解。”<sup>①</sup> 我认为金冲及教授这段论述是很精彩的，是他半个多世纪研究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领袖人物生平思想的一个深刻的体会。这一点也是学术界的共识。

这里，我们联系到改革以来，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据人考证，陈云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领导经济工作中就多次讲过这句话。改革开放后，邓小平、陈云更经常讲这个话或这个意思。这句话正好是我们的事业要在探索中前进的形象的说明。为什么要在探索中前进呢？邓小平有很好的说明：“我们现在所干的事业是一项新事业，马克思没有讲过，我们的前人没有做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所以，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学。我们只能在于中学，在实践中摸索。”<sup>②</sup> 邓小平这里说的“新事业”是指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是现在和平年代的事业，而在过去战争年代，有时甚至都不允许你去摸石头就得过河，犯错误、走弯路，可以说是难免。当然，犯不犯错误，同是否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应该看到的。

总之，我们主张确立“探索”的观点，如果不确立这样的观点，而把

<sup>①</sup> 《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3期。

<sup>②</sup>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8—259页。

注意力主要放到其他方面,甚至把领导人犯错误说成有意作恶,是一种“原罪”,或过分强调权力之争,那就走到斜路上去了,不能实事求是地说明历史。

(二)分析的观点。即对历史问题采取分析的态度。

毛泽东有这样的名言:“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这应该是普遍真理。但要把这种分析的精神真正贯彻到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中来,特别是贯彻到党史方面的研究中来,是很不容易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是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评价,还是对思想观点、文献著作的评价,绝对化的倾向,都是存在的。好就是好,一切皆好,坏就是坏,一切皆坏。这种倾向影响着对历史的正确的说明。当然,现在的情况比过去好多了。我们应该进一步提倡分析的态度,反对绝对化。

以对待党的历史文献为例。前面讲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在探索当中前进的。既然是长期的探索过程,就难免有失误,甚至犯严重的错误。正确与错误,有时体现在不同的人和事上,有时体现在同一的人和事上,它们都由历史文献记载下来。如果不对历史文献、特别是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的文献采取分析的态度,就很难如实地说明历史的进程。

如大革命时期,学术界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这个时期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否有一篇代表作完整地表达了这一基本思想呢?应该说没有。或者说,在当时比较重要的论著中,是否有哪一篇完全正确、哪一篇完全错误呢?应该说也没有。过去讲,陈独秀的几篇文章是右倾机会主义的,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形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这也是不符合实际的。陈独秀的文章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对奠定党的革命思想所起的作用不应被忽视。毛泽东的著作有其特殊的建树,但历史局限也是明显的。当时众多著作中,肯定无产阶级领导地位者,往往同否认或贬低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相联系,而承认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性者,又往往认不清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瞿秋白1927年2月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被认为是最早反对党内右倾错误的纲领性作品。我们看这篇长文,其中确实有许多深刻的论述,但错误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对诸如此类的文献,只有采取分析的态度,既恰当地指出其正确和创新的方面,又指出其错误和